

东山书院：儒学传播高地

□ 董文强



沂蒙山，这片孕育革命精神的红色土地，曾在历史上因临近儒学圣地曲阜，留下过诸多孔子的遗迹。蒙山，便是孔子“小鲁”所登的“东山”。孔门三千弟子中，曾参、仲由、澹台灭明等人均来自于此。这些圣学遗迹，成为元明清三代士人创建东山书院、复兴儒学的宝贵遗产和精神源泉。

（一）

金朝统治下的山东地区，“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学者不知有所谓四书”。待到元朝统一南北后，儒学在官方和士绅的推动下，有所恢复。元世祖忽必烈推行封建化，保护书院，倡导儒学，“中统二年夏六月，诏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增加孔庙从祀人员，“诏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许衡并从祀孔子庙庭”，十一月决定来年八月开科取士。由此，山东地区的书院也进入复兴期。

在蒙山以西四十里的狄家庄（后名康家寨），费县康氏家族创建有家族学校，培育人才。这便是后来东山书院的前身。创建者康恭，字辅之，官至谏官，颇有政声，因刚正不阿而遭贬斥，归于林下。家族中有崇尚尚学之风，其兄长康晔为金朝进士，曾受聘为东平府学教授，门下弟子出类拔萃，使得东平府学成为元朝山东乃至北方重要的儒家文化传播中心。康恭平日自己手不释卷，也注重子孙的诗书教育，在朝廷下令重开科举前的3个月，他紧跟兄长步伐，决定倡导复兴儒学，创办学校。此举获得好友唐君的认同，二人合资购地数亩，兴办此所义学。学校规模较小，房间仅有三间正堂，但复兴沂蒙文教的意义非凡。

康恭并没有将义学作为康氏一门私塾，而是坚持开放办学，惠泽乡

里，聘请名师任教，吸引附近向学的读书人前来学习。“来者云集，教养而作成之”，此义学很快成为当地知名的文教中心。康恭作为主持者，在校讲学，提携后进，其子康若泰从书院走出，考取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族外李彦博也高中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郯城县尹李彦申、胶州提举牛克明也出自康恭门下。

康若泰继承父志，兴学育人，弟子众多，科名成功者不少。如蒙阴县尹陈稷、景山书院山长徐奔、山东宪司书吏侯泰，曾随之学习，成功入仕。元朝选官方式中，科举不是主要途径，自元仁宗开始，前后仅开科16次，录取进士1139人。康家寨义学由于勤勉办学，后在科举恢复的东风下，取得斐然成绩，走出进士至少3位，举人多名。

康氏家族为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继续加大义学投入，康恭之孙、康若泰之子康宣继承父祖遗志，联合乡里有心兴学之士，扩建义学，增设圣文宣王燕居堂，用作讲学；创建十二间斋舍，用作学习和住宿；塑造孔子圣像，春秋两季祭拜，践行儒家奠献之礼。经过修葺与扩建，康氏义学焕然一新，完全符合书院规制。于是，康宣便依据孔子登东山传播儒学的遗意，将义学更名为东山书院。

在元朝科举不太盛行的时代，兴学义举难能可贵。康氏祖孙三代相承，创设和扩建传播儒学的义学和书院，使之成为地区教育中心，直接改善了当地人成长环境。书院是儒学“圣迹”的雏形，兴办书院善举感化士人，因此康氏兴办书院，使得圣人之

学通过有声的读书和无声的感化，在沂蒙山区传播开来，孕育出代代星火传人。“习于斯者，日新月磨，涵养熏陶，久而勿替，将见人才超卓，衣冠济济，出而见用于世，其可量哉！”

（二）

明朝东山书院衰败无闻，时至清朝，再获新生。清朝马上立国，而下马治国，极为重视文教。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江西白鹿书院重修后，中央借机下令要求地方官员，劝学兴文，加强思想教化工作。岳浚在雍正六年（1728年）上任山东巡抚后，按令行事，复兴地方儒学，下令州县设官祭祀孔子。东山书院在此时代背景下得以重修。

康熙、雍正年间，蒙山南麓贯庄人郭氏祖孙三代，历时20年，兴复东山书院。他们功名不高，但尊崇儒术、兴教助学的热情高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郭选眼见东山书院废弃，本地儒学式微，便倡议兴复书院，率先捐献土地，用作建造宿舍。刘洙等有志之士慷慨响应。因此，郭选集合众力，在贯庄东南创设一座书院，规模很大，占地十亩，建有六间瓦房，十二间草房，还有二十八亩六分土地，用作日常祭祀。书院名称沿用元朝东山书院之名，体现对前代乡贤兴学传统的延续。之后，郭选之子郭良贵又继续维持书院运行。二人义举获得曲阜孔氏衍圣公的认可，为他撰文募捐，并自己率先捐资帮助。

雍正五年（1727年），郭翘楚继承

父祖遗志，继续修葺东山书院。郭翘楚，拔贡，入国子监读书，后担任沾化教谕，仿效程朱理学先贤，尽心教导士人，在任5年，赢得当地士林心悦诚服。归乡之后，郭翘楚仍挂心儒学传承，便有兴学之举。他并非只是营建书院建筑，还制定了书院规章制度。该制度内容极为详实，参酌古今书院制度而成，多达四卷，足见他对手书院极为用心。后人对此大加赞叹，“正人心而排邪说，虽古好学者名儒，力行不倦者，当不是过”。如此，东山书院再获发展，继续担负延续圣学的责任。

雍正七年（1729年）东山书院移建竣工时，由第68代衍圣公孔传铎之胞弟、翰林院五经博士孔传铉作《移建东山书院记》，镌碑立于书院。雍正八年（1730年）大学士陈世倌书“东山书院”匾额悬于讲堂。东山书院移建后，郭翘楚常约友朋讲学，立规条，严考课，培育出许多人才。后人曾于东山书院设立祀位纪念他。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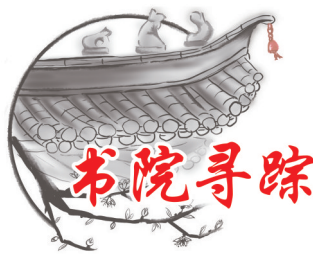
东山书院在移建后，名声大振，获得地方官府的支持。乾隆七年（1742年）续修后，知县夏默允为之撰写《经理书院记》。然而，书院运转经费很大，郭翘楚家境一般，之后子嗣不壮，书院逐渐破败。幸运的是，恰逢清朝进入繁盛时期，朝廷重视文教，臣公也积极参与其中。乾嘉之际，诸多考据学者聚集到山东为官，如毕沅、阮元、孙星衍等人。他们为官之余，痴心于学术研究，为东山路

院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乾隆六十年（1795年），“钱塘周君”周为霖游览蒙山，留恋不已，便辞官卜居该地，看到书院破败后，痛心疾首，慨然担负起兴复责任。他深知一人之力，难成大事，不远千里，联络好古向学的孙星衍，请他发挥影响力，为书院修繕募捐。孙星衍是乾嘉时期知名学者，与学术圈交往广泛，此时正任山东督粮道。接到周为霖的请求后，他积极响应，撰文叙述蒙山地区儒学传承历史，感叹当地读书敦行之士众多，讲述阮元、毕沅在山东推动儒学发展的事迹，以期唤起同道中人的共鸣，一起襄助书院建设。他积极调用个人关系，为书院修葺鼓舞与呼，联系私交密切的山东巡抚玉德和济南知府徐大榕，一起支持东山书院兴修，为复兴儒学贡献力量。他还致信刚从山东到湖北任总督的毕沅，希望获得他的赞助。

东山书院随之得到兴复，书院学生渐众，虽然获得进士、举人者少，但涌现出一批生员。这说明书院在当地的教育中发挥着较大影响，也为儒学在沂蒙地区的传播作出积极贡献。

东山书院一直运转到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小学堂，以新式学堂的形式，继续发挥兴学化民的作用。然而，屡经战火洗礼，书院建筑已荡然无存，仅有部分石柱和匾额保留下来。近年来，部分热心人士推动东山书院文脉的延续，在蒙山山麓重建东山书院，用作文化、艺术、教育交流，也有文教工作者编纂记述东山书院发展历史的志书，行将面世。东山书院的余辉仍然照耀着这片土地。



大学要 加强 通识教育

□ 于志刚

处理好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与通识教育不同，专业教育旨在为学生从事某一职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作准备，强调学生应掌握必需的实用知识和技术。实际上，关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如何协调、平衡的争论，以及如何“相互结合”的实践探索，是一个长期存在、常说常新的话题。2003年，我们明确提出了“通识为体、专业为用”的本科教育教学理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施，得到广大师生的广泛认同，取得了很好的育人成效。所谓“通识为体”，是强调“通识”的基础性、本源性，即通识教育是学生成人、做人的基础；所谓“专业为用”，则是指学生应当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具备从事一项专业工作所必需的职业素质和能力。“通识为体、专业为用”的本科教育教学理念符合教育的两大基本规律：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规律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规律。如何实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我们认为应采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渗透、相融合的形式，而不是简单地堆砌。

不断创新发展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首先是“经典的”，但不一定只能是“经典的”，它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因不同国家和民族文明的不同而各具特色。我们建议通识教育课程要实现“现代化”和“中国化”。所谓“现代化”，是指在通识教育体系中增加地球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生态文明等新兴、前沿、交叉学科内容，这些学科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的认知，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世

把通识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各方面

通识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教育，它更加注重人的培养，强调能力的训练和人格的养成，更加重视学生的自主探索和体验，也是一种教育文化。加强通识教育，不仅要建设高质量的通识课程，还要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的通识教育元素；不仅要重视课程学习，还要重视实践环节，有效开展书院生活、社会实践等，在实践中反思，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尤其要注重研读经典，这既是获取知识、汲取智慧、促进精神成长、实现“通识”的重要途径，也是在网络环境下破除碎片化学习、打破“信息茧房”，避免成为随波逐流失去方向和灵魂的“学习漂泊者”的有效方法。注重采用跨界、跨学科的方式，在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过程中，在课程教学与实践锻炼的结合中不断探索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教育形式，使得通识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学生既有宏观见解又有解决微观问题的能力，逐步迈向“既能登高望远，又能探幽入微”的境界。

通过不断创新发展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不断丰富通识教育的方式方法，把通识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各方面，加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通识教育，是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应积极探索实践，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造就一大批栋梁之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校长）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上接1版）云南有着丰富的自然文化，全国绝无仅有的多样性气候类型造就了“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多元自然景观，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世界花园”，有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世界自然遗产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石林、澄江化石地。这些文化都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体现着中华文明多元统一、向内凝聚的价值追求。我们要把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把这些价值充分发掘出来，让文化自信融入全省各族人民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建设文化强省，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是题中应有之义，深挖文化潜能扬优势是实现路径所在。我们要从实现心物俱丰、心物统一的现代化的高度，在促进云南特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创新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留住文化记忆、赓续历史文脉，体现当代价值。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元谋猿人生命起源科学探寻项目，实施“西南夷考古”等重大项目，加快长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云南段）和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加强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街区）和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推动文物资源数字化、品牌化，让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推进云南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在各民族中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动各民族文化深层开发、保护利用、传承发展，充分挖掘云南少数民族诸多典籍中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促进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团结统一。推进云南革命文化保护传承发展，以必须办实办好办出成效的坚定自觉，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聂耳和国歌等“五个故事”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相关红色资源有效转化，构建作品体系、产品体系并做好宣传推介工作，充分挖掘艾思奇推进理论大众化、柯仲平推进文艺大众化的价值意义，深度挖掘辛亥腾越起义、昆明重九起义、滇西抗战、“一二·一”运动等革命故事，保护利用好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故居等革命文物和滇西抗战、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等抗战遗迹，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推进云南自然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坚持以文塑旅、寓文以

旅，加快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强化文化、服务、科技赋能旅游，将文化元素、文化符号、文化创意融入旅游景区景点和旅游产品，在民宿改造提升、特色村寨打造、景区景点管理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内容，精心打造体现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特色旅游精品，大力推进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加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充分彰显云南文化独特魅力，大力提升云南旅游文化内涵，让游客欣然奔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守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把云南旅游打造成为生活之旅、文化之旅，使旅游成为宣传中华灿烂文明和云南特色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成为传播科学知识和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在优美风景和绚烂文化之旅中实现心灵的温润、精神的熏陶、素质的提升。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自信开放包容始终是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质、中华民族的气度胸襟。开展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云南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区位优势。在长期交往交流中，南亚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传统、节日、习俗等方面受中华文明影响深远，表现出与中华文化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和文化特征，中华文化在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亲和力。云南有4060公里边境线，有16个跨境民族，8个州（市）的25个边境县与3个国家交界，先后与9个国家搭建12个多边双边合作机制，中越、中老、中缅国际通道高速公路境内段全线贯通，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南亚东南亚国家首都和重点旅游城市航线基本实现全覆盖。云南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全面胜利，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的第二次“一步跨千年”，兴边富民行动取得的显著成就，边境一线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边境地区口岸城市、中心集镇日益繁荣，现代化边境幸福村的美好画卷正逐步变为现实，这些都向周边国家生动展示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中国发展奇迹，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为云南开展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充分的物质条件。

全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提出的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一战略定位，加快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人文交流中心建设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要建强用好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加强与国家级外宣平台的合作交流，着力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区域性新型主流融媒体集群，充分发挥在境外落地的外宣期刊、多语种网站、澜湄国际卫视、中华文化中心、中华乡愁书院、华文书局等外宣阵地作用，扎实推进民间国际传播“珍珠链”工程，开展特色鲜明、富有实效的边境外宣和口岸外宣，形成既步调一致、齐头并进，又各具特色、各展所长的良好国际传播工作态势，采用外国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面向周边国家和民众全面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风采魅力，充分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主动讲好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就的故事，讲好云南边境地区、民族地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故事，讲好云南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与周边国家深化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故事，深化其对中国的认知，增进其对中国的情感，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更好走进周边国家民众心里。树立全球视野、坚持国家站位、突出云南特点，精心策划组织“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系列活动，围绕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以南亚东南亚国家为重点，发挥区位优势，秉持开放包容，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方式，统筹宣传、文化旅游、外事、教育、卫生、科技、侨务等各方资源和力量，以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文明、活力、开放、团结、绿美、温暖的云南为重点，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策划开展文化周、艺术节、旅游节、影视展、体育比赛、书画展、摄影展等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提升“跨国春晚”、“美丽中国·七彩云南”、“花好月圆”中秋文化交流等国际文化交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强“洱海论坛”“怒江论坛”“大象国际传播论坛”等平台，在人文交流领域推动形成更多合作成果，推进更高水平的文化开放，让南亚东南亚国家从精神和价值层面认识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为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作出云南贡献。

（作者系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